

LA TREGUA

174517

再度觉醒

Primo Levi

THE REAWAKENING

[意] 普里莫·莱维 著

杨晨光 译

Primo Levi

THE REAWAKENING

再度觉醒

[意] 普里莫·莱维 著

杨晨光 译

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北京

LA TREGUA (THE REAWAKENING)

by Primo Levi

Copyright © 1963, 1997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.p.a., Torino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.

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度觉醒 / (意) 莱维 (Levi, P.) 著 ; 杨晨光译. — 北京 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135-6745-9

I. ①再… II. ①莱… ②杨… III. ①回忆录—意大利—现代 IV. ①I546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4315号

地图审图号: GS (2015) 2118号

出版人	蔡剑峰
策划人	严搏非
项目统筹	李伟为
特约编辑	窦飞翔 杨晓琼
责任编辑	孙嘉琪
执行编辑	姜霁淞
装帧设计	pdo
出版发行	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社址	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 (100089)
网址	http://www.fltrp.com
印刷	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开本	880×1240 1/32
印张	8.25
版次	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135-6745-9
定价	39.00元

购书咨询: (010) 88819929 电子邮箱: club@fltrp.com

外研书店: <http://www.fltrpstore.com>

凡侵权、盗版书籍线索,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

举报电话: (010) 88817519 电子邮箱: banquan@fltrp.com

法律顾问: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

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

物料号: 267450001

凄苦的夜里，
常有同样的梦，
惊悸而繁杂的梦。
梦中灵魂与躯体，
回到家里，吃着东西，
讲述着我们的故事。
直到，飞快而平静地，响起
清晨的起床令：

*Wstawàch** ；
心便在胸膛中碎裂。

现在我们又回到家中，
我们的饥饿已经结束，
所有的故事已经讲述。
是时候了。我们会很快再听到
异国的叱令：

Wstawàch。

1946 年 1 月 11 日

* *Wstawàch* 意为起床。

目 录

001 | 消融

009 | 主营

024 | 希腊人

050 | 卡托维兹

065 | 塞萨尔

080 | 胜利日

092 | 梦想家

104 | 向南

118 | 向北

127 | 小母鸡

138		老路
149		树林与小路
162		假日
178		剧场
189		从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到雅西
202		从雅西到美苏分界线
217		再度觉醒
223		后记:普里莫·莱维答读者问
249		译后记

消融

一九四五年一月初，迫于苏联红军的巨大压力，德军匆忙疏散西里西亚（Silesian）矿区。在其他地区，类似的情况下，德军会毫不犹豫地纵火或使用武器，摧毁集中营，屠杀其中的囚犯。但在奥斯维辛地区，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：德军高层（似乎是希特勒本人）下令不惜一切代价，回收每个还能干活儿的苦力。因此，所有健康的囚犯都被疏散，在极为可怕的条件，前往布痕瓦尔德（Buchenwald）和毛特豪森（Mauthausen）。而病人则被扔下听天由命。凭着证据，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断，德军原本并不想在集中营里留下一个活口。但夜间猛烈的空袭和苏联红军的迅速推进迫使他们改变了主意，扔下未完成任务而逃之夭夭。

在布纳-莫诺维茨（Buna-Monowitz）集中营的病区里，留下了八百名囚犯，其中大约五百人在苏军到来前死于疾病、寒冷和饥饿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即使得到了苏军的救助，仍有两百人陆续死亡。

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，中午时分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红军巡逻队。我和查尔斯最先看到他们——我们正把索莫奇的尸体搬往乱葬坑。他是我们死去的第一位室友。我们把担架倾覆

在肮脏的积雪中，因为乱葬坑里早已堆满了死人，而附近再没有其他墓坑。查尔斯摘下他的贝雷帽，作为对活人和死人的致敬。

四名马背上的年轻士兵，沿着作为营区边界标志的道路而来。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冲锋枪，驻足于铁丝网边，向里张望，相互偶尔说上几句话，把陌生而尴尬的目光投向杂乱的尸体、破败的营房和我们这几个还活着的人。

在灰色的雪地与天空之间，在预示着消融的潮湿烈风之中，岿然高踞于骏马之上的士兵，在我们眼中，显得极为具体而真实。

可以说，我们就像流星，在充满死亡的虚无中游荡了十天，终于触到它那坚实的中央，一颗聚凝的核心。四个人，全副武装，却并非我们的敌人——四名和平的信使。厚厚的皮帽下面露出他们粗糙而孩子气的脸。

他们不向我们打招呼，也不微笑。似乎不仅是同情，还有难以言表的局促，压抑着他们的心灵，封闭着他们的双唇，让他们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开这殡葬般的场景。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——每次筛选¹之后，每次我们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种暴行之后，这份羞耻就会吞没我们。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，只有正义之人见证了他人的罪行时才体会得到。它是一种罪恶感——这样的罪行竟然存在，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；而目睹了这桩罪行的人们，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是如此软弱或徒劳，他们面对这罪行却束手无策。

所以，即使当自由的钟声庄严而沉闷地敲响时，我们的心中

1 指挑选送进毒气室的犯人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注释除特别标注外，均为译者注）

也不只是喜悦，还充满了痛苦的羞耻。这痛苦如此深切，竟使我们妄想洗去记忆与意识中的污秽。这痛苦如此强烈，因为我们感到这罪行原本永不该发生。但现在，哪怕最美好的善良，最纯洁的心灵也无法抹掉我们的过去。这伤疤、这暴行，将永存于我们的灵魂深处，永存于目睹暴行之人的记忆里，永存于暴行发生的地方，永存于我们对这暴行的控诉中。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犹太民族的可怕特权，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罪行，了解它的本性就像一场蔓延的瘟疫，无法治愈。以为人类的正义能够荡涤这罪行是愚蠢的。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恶之泉；它摧毁躯体，也摧毁躯体中的灵魂——它扼杀人们的良知，让人们变得卑鄙无耻；它是报应在压迫者头上的耻辱；它是滋生于幸存者之中的仇恨；它有一千张面孔，或为复仇的渴望，或为道德的妥协，或为对信仰的背弃，或为对人生的厌倦，或为对权利的抛弃，麇集于众人之间，而全然不顾人类追求正义的意愿。

在那昏昏沉沉的岁月，在我们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余，大多数人感到，这痛苦与羞耻不过是致命的疲劳的一次意料之外的打击。因此，很少有人去欢迎我们的拯救者，很少有人去感谢上帝。当一些人开始拆除铁丝网的时候，我和查尔斯仍然站在堆满一层层苍白尸体的墓坑边。随后，我们拖着空担架，回去向我们的狱友报告这个消息。

那天没发生任何其他事。这倒不让我们惊讶，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日子。在我们的牢房里，老泰尔马上占据了死去的索莫奇的床铺，这让我的两个法国狱友厌恶不已。

据我所知，泰尔，是一个“红三角”，一名德国政治犯，这集中营里的“老资格”。所以，他理所当然成了集中营里的一名贵

族。他不用干活儿(至少在最后一年里),可以收到从家里寄来的食物和衣服。出于这些原因,在病房中很少能够看见德国“政治犯”。不过,他们在病房里倒享有各种特权:最重要的是不用参加筛选。解放时,泰尔是病房中唯一的政治犯,逃走的党卫军任命他为第二十区的头子。在这个区里,除了我们这个住满高传染性疾病的病人的病房,还有肺结核和痢疾病房。

作为一名德国人,他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靠不住的任命。在党卫军离开和红军到达之间的十天里,在每个人都经受着饥饿、寒冷和疾病的最后折磨时,泰尔却勤勉地视察他的新封地,检查地板和碗的状况,检查毯子的数量(每人一张,不管死人还是活人)。有一次检查我们病房时,他甚至表扬了亚瑟所保持的秩序和卫生。亚瑟听不懂德语,更听不懂泰尔的撒克逊方言,回敬他说“vieux dégoutant”(法:老混蛋)和“putain de boche”(法:他妈的德国人)。尽管如此,从那天起,泰尔开始公然滥用他的职权,每天傍晚都到我们的病房里舒舒服服地使用房间里的马桶。这是整个营区唯一靠近火炉并定期清洁的马桶。

直到解放前,老泰尔一直是一个异类,也因此成为一个敌人。而且,他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,所以是一个危险的敌人。对于像我这样的人,也就是集中营里大多数人来说,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其他区别——在集中营度过的这漫长的一年中,我既没有好奇心,也没有机会去了解集中营复杂的等级体系。各种权力组成的阴暗大厦完全凌驾于我们头上,而我们的目光则被迫朝向大地。然而,泰尔,这位在党内外上百次斗争中变得坚强、在十年残酷而麻木的集中营生涯中变得僵化的老战士,却陪伴我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夜晚。

整整一天，我们都忙着谈论这件事，这不仅因为我们觉得它代表着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，也因为大概在潜意识中，我们不得不找些事做，避免闲下来，因为面对自由，我们感到自己茫然、空虚、退化，不能胜任自己的角色。

入夜，病友们都睡着了。查尔斯和亚瑟也坠入了单纯的梦乡，因为他们来到集中营才一个月，还没有沾染它的毒素。而我自己，尽管筋疲力尽，却正因为疲劳和疾病而无法入睡。我四肢酸痛，血管在脑袋里剧烈地搏动着。我感到自己发着高烧。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，正是这个时刻，各种威胁似乎都消散了，恢复人生的希望不再疯狂。然而，仿佛决堤似的，全新却更剧烈的痛苦压倒了我。之前，其他更紧迫的痛苦——被投入集中营的痛苦、远离家园的痛苦、失去朋友的痛苦、失去青春的痛苦以及身边死者枕藉的痛苦——掩盖了这全新的痛苦，将它排挤到我的意识边缘。

在布纳集中营度过的这一年中，我目睹了五分之四的伙伴消失，但我从未直面过具体的死亡。此时此刻，死亡那肮脏的气息离我只一步之遥，它在窗户外面，在旁边的床铺上，在我的血管里。因此，我处于一种病态的半清醒状态，心中满是阴郁的念头。

但很快我意识到还有人醒着。熟睡的人们那沉重的呼吸声，不时被淹没在一阵阵粗哑而不规律的喘息声、咳嗽声、呻吟声和压抑的叹息声中。泰尔在哭泣，流淌着一个老人那执拗而不知羞耻的眼泪，就像老人的裸体一样让人难以忍受。他也许看到我在黑暗中翻来覆去；而且，直到那一天，他和我虽出于不同的原因，却同样寻求的孤独，一定也让他此刻备受煎熬，因为

在午夜时分，他问我：“你还醒着吗？”他没等我回答，就吃力地走到我的床边，也没请求我的允许，便坐在了我的身边。

相互理解并不容易，不仅因为语言上的障碍，也因为在那长夜中压负着我们的思绪是沉重、惊人而可怖的，但最重要的是，这思绪让我们困惑。我告诉他，我在思念家乡，而他在停止哭泣后，嘟囔着：“十年，十年了。”在十年的沉默之后，他以低哑、可笑却庄严的声音唱起了《国际歌》。这歌声让我感到五味杂陈，既茫然，又感动。

第二天清晨为我们带来了第一丝解放的迹象：来了大约二十个波兰人，男男女女，显然是俄国人²派来的。他们开始毫不情愿地四处劳作，试图为营房里恢复一些秩序和卫生，清运尸体。大约在中午，一个吓坏的孩子牵着一头母牛的缰绳走来。他让我们明白这头牛是给我们的，俄国人让他送过来，然后他扔下这头牲口，像闪电一样逃走了。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这头可怜的牲口就在几分钟内被宰杀了，大卸八块。每个幸存者栖身的角落都分到了一些牛肉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中，我们看到了更多波兰姑娘在营区走来走去，因为恶心和同情而面色苍白：她们给病人洗澡，并竭尽可能地照料他们的病痛。她们还在营区中央生起巨大的篝火，用的是从破败营房上拆下的木板。她们在这火上用能够找到的各种锅碗瓢盆煮汤。终于，在第三天，我们看到扬克尔，一名

2 本书中的“俄国人”一词在英译本中作为 Russian，依据文意，Russian 既可能指苏维埃俄国人民，也可能指苏联境内其他加盟国人民。本书将 Russian 统译为“俄国人”，具体指称望读者结合语境判别为宜。——编者注

“Häftling”(德:囚犯),快活地驾着马车驶进了营区:他是一名年轻的俄罗斯犹太人,也许是幸存者中唯一的俄国人,这样的身份让他自然成为幸存者与苏军指挥部之间的翻译与联络官。在他鞭子的脆响中,他宣布苏军命令他把所有幸存者送到奥斯维辛³的主营区。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检疫所。他负责每天运送一小队病人,大约三四十人,从病情最危重的幸存者开始。

同时,我们多天来所担心的消融已经开始。随着冰雪渐渐融化,营区开始变成一个肮脏的泥坑。尸体和垃圾让潮湿、混浊的空气难以呼吸。死亡也没有停止它的脚步——许多病人死在了他们冰冷的床上。泥泞的路边随处能见到他们的尸体,似乎是突然倒毙。那些最贪心的幸存者,盲目地服从我们长年饥饿所导致的强烈食欲,用苏军配给肉食撑死了自己。那时苏军仍在激烈战斗。他们把配给的食物毫无规律地送往集中营:有时很少,有时没有,有时却疯了般地丰富。

但我只能用一种断断续续、模模糊糊的方式来了解我身边发生的事情。疲劳与疾病,就像凶残而胆怯的猛兽,等着我放松戒备的时刻,从背后对我突然袭击。高烧让我变得麻木,处于半清醒状态。查尔斯像兄弟一样照顾着我,而干渴和各个关节的剧痛让我深受折磨。没有医生,也没有药。我的喉咙痛,半边脸肿了起来;皮肤变得又红又硬,像被炙烤一样疼。也许我同时患上了多种疾病。等轮到我爬上扬克尔的大车时,我已经没法站

3 奥斯维辛,位于波兰小城奥斯维辛附近的四十多座集中营的总称,奥斯维辛、比克瑙、莫诺维茨是其三个主要营区。

起来了。

查尔斯和亚瑟扶着我上了大车。车上载满了像我一样奄奄一息的幸存者。阴郁、低沉的天空飘着细雨。随着扬克尔的马迈着缓慢的步伐拉着我走向遥远的自由，我最后一次看那一排排营房。正是在这营房里，我遭受过痛苦，也变得成熟。我最后一次看到了点名的操场。那些绞架与巨大的圣诞树仍然在操场两边伫立着，遥遥相对。我最后一次看到了通往奴役的大门。大门上仍然镌刻着那三个（如今毫无意义的）可笑的大字：“Arbeit Macht Frei”（德：劳动使你自由）。

主营

在布纳,我们对“主营”,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所知甚少:囚犯很少从一个集中营调往另一个集中营。即使遇到这样的囚犯,他们也少言寡语,而且他们的话让人们难以置信。

当扬克尔的大车穿过那道著名的门槛时,我们都惊呆了。拥有一万两千名囚犯的布纳-莫诺维茨集中营相比之下只是一个小村庄;而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无边无际的大都市。没有单层“平房”,而是无数阴暗的、方正的、灰色砖石楼房,三层高,全都一模一样;楼房之间有着平坦的道路,有着笔直的线条和直角弯,一直延伸到我们目力所及的远方。在阴沉的天空下,在充满泥泞、寒雨与废墟的天地中,每样东西都显得荒废、沉默而刻板。

正像我们漫长旅程中的每次转折,在主营,我们惊讶地迎来了一场沐浴,尽管我们当时还需要很多其他东西。但这不是羞辱的沐浴,不是古怪的邪恶圣典式的沐浴,不是标志着我们坠入集中营世界的那第一场安魂弥撒¹式的沐浴,也不是几个月后,

1 安魂弥撒:指天主教用于悼念死者而进行的弥撒。

我们在美国人手中接受的那种功能性的、除菌的、高度自动化的沐浴。这是俄罗斯式的沐浴，符合人性的尺度，却仓促而粗鲁。

我并非质疑一次沐浴对于当时的我们不合时宜：事实上，这是必需的，而且也不是不受欢迎。但在这次沐浴中，以及在那三次难以忘记的洗礼中，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具体的表面现象背后看到巨大的象征意义，新的行政当局潜意识的期望——期望把我们纳入他们自身所在的圈子，剥去我们之前人生残留下来的痕迹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符合他们模式的新人，将他们的特征强加于我们。

两名苏联护士用强壮的臂膀把我们抬下大车：“Po malu！”（俄：轻点，慢点！）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句俄语。她们是两个精力旺盛而经验丰富的姑娘。她们把我们带到营区中一栋已经基本修复的建筑中，脱掉我们的衣服，让我们躺在铺在地上的木板上，用温柔却毫无顾忌的双手，给我们从头到脚打上肥皂，擦洗、揉搓，再擦干。

亚瑟提出了一些雅各宾式的道学抗议。他称自己是“libre citoyen”（法：自由公民）。在他的潜意识中，女性的双手接触到他那赤裸的皮肤是有悖于祖先留下的禁忌的。除此之外，这次沐浴我们大家进行得都很顺利、迅速。但轮到这群人中的最后一个时，两个护士却遇到了一个大问题。

我们没人知道他是谁，因为他已经虚弱得无法讲话。他全身黝黑，是个光头的小个子，像树根般扭曲着身体，瘦得皮包骨，由于肌肉的可怕萎缩而蜷缩着。她们把他从大车上搬下来，就像搬一件毫无生气的行李。现在他侧身躺在地上，佝偻着身子，全身僵硬。他的膝盖抵着额头，双肘蜷缩在身体两侧，而双手的

手指像楔子一样，牢牢地抓着双肩，摆出一副绝望的防御架势。那对俄罗斯姐妹不知所措，徒劳地尝试舒展开他的身体，让他仰面躺在地上，结果他发出老鼠一样的尖叫声：她们尝试了各种办法，却毫无进展；他的四肢在压力之下勉强伸直了，但只要她们一松手，它们就迅速弹回原先的位置。于是，两个护士决定就这样把他抬到喷头下面。她们有着明确的规矩，竭尽全力去清洗他的身体，费力地把海绵和肥皂塞进他那扭结的肢体中；最终，她们尽职尽责地冲洗他，往他的身上倒了两桶温水。

我和查尔斯，赤着身子，冒着热气，既同情又害怕地看着这场面。随着护士拽开他的一条胳膊，我们在一瞬间看清了那文在小臂上的囚犯编号：他的编号在 200000 以上，是个来自孚日山脉(Vosges)的犯人。“Bon dieu, c'est un français!”(法：老天爷，是个法国人!)查尔斯惊叫着。说完，他默默地转过身去，脸冲着墙壁。

俄国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套衬衫和裤子，再把我们送到他们的理发师那里，让我们进行集中营生涯中的最后一次理发。理发师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大个子，有着野性而茫然的眼睛：他理发的方式粗暴而笨拙，而且出于我所不了解的原因，肩头挂着一挺冲锋枪。“Italiano Mussolini”(意：意大利人墨索里尼)，他恶狠狠地对我说；而对法国人，他说：“Fransé Laval.”(法：法国人赖伐尔²)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理解个体事例时，一般性常识是多么地苍白无助。

2 皮埃尔·赖伐尔(Pierre Laval, 1883—1945)：法国沦亡后，1942年4月，在希特勒的支持下，出任维希政府总理。1943年通过“义务劳动制”，将数十万法国工人强制送往德国服苦役。1945年10月9日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，15日被处决。